



鲁迅的生平及杂文

李 何 林

鲁迅的生平及杂文

鲁迅的生平和斗争与其杂文的思想性和艺术性

(修改稿)

李 何 林

陕 西 人 民 出 版 社

鲁迅的生平及杂文

(修改稿)

李何林

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西安新华印刷厂印刷

陕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

1973年5月第1版

1973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40,000

书号：10094·65 定价：0.24元

(内部发行)

毛主席语录

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鲁迅的两句诗，“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应该成为我们的座右铭。

毛主席语录

有人说，几百字、一二千字一篇的杂文，怎么能作分析呢？我说，怎么能呢？鲁迅不就是这样吗？分析的方法就是辩证的方法。所谓分析，就是分析事物的矛盾。不熟悉生活，对于所论的矛盾不真正了解，就不可能有中肯的分析。鲁迅后期的杂文最深刻有力，并没有片面性，就是因为这时候他学会了辩证法。

“杂文时代”的鲁迅，也不曾嘲笑和攻击革命人民和革命政党，杂文的写法也和对于敌人的完全两样。

目 次

一、我对如何解决学习鲁迅杂文的三种困难 的一些想法 (1)

二、从鲁迅的生平和斗争看他的杂文 的思想性 (4)

(一)1881—1898, 在浙江绍兴, 少年时期(18岁以前)

(二)1898—1909, 在南京和日本, 青年时期(18—29岁)

(三)1909—1917, 辛亥革命前后到十月革命(29—37岁)

(四)1918—1923, 五四时期 (38—43岁)

(五)1924—1927,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44—47岁)

(六)1927—1936, 上海时期, 鲁迅一生的“后期”

(47—56岁),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1、1927—1929, 由进化论到阶级论, 由朴素的唯物论
和革命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

2、1930—1934, 反蒋匪帮的反革命文化“围剿”; 反
日寇侵略、反蒋匪帮的反革命军事“围剿”和卖国
投降政策; 反“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

甲、反革命文化“围剿”和“反围剿”

乙、反日寇侵略、反蒋匪帮的反革命军事“围
剿”和卖国投降政策

丙、反“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1930—1934)

3、反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1935—1936)

三、鲁迅杂文的艺术性 (40)

(一) 典型性

(二) 形象性

(三) 讽刺和幽默

(四) 抒情成分

(五) 语言特点

附录：一、鲁迅论杂文(李何林辑录) (53)

二、鲁迅的许多书名是什么意思

(乐真稿，李何林增加修改) (66)

三、鲁迅年表(上海师大中文系稿) (71)

四、为什么要提倡读一些鲁迅的杂文

(雷军) (97)

同志们：我是一个正在改造的老年知识分子，几年来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和业务上再学习，都进展得很慢。过去虽然学过一些鲁迅的著作，也搞过这一方面的教学，但是对于鲁迅并没有真正的了解，甚至有些错误的了解。由于前些时候和南开大学中文系几位同志搞过几个月的《鲁迅杂文选》的注释工作，大家叫我来谈一谈鲁迅的杂文；因为我也正在学习，就来谈一谈吧；谈出来更可以和同志们商量。

首先我想谈一谈“我对如何解决学习鲁迅杂文的三种困难的一些想法”；其次，我想通过介绍鲁迅的生平和斗争来看他的杂文的思想性，就是按照他所生活的几个时期，来看他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进行了怎样的斗争，并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他是怎样由朴素的唯物论和进化论及革命民主主义者进到辩证唯物论和共产主义者。最后再谈一谈他的杂文的艺术性。

一、我对如何解决学习鲁迅杂文的三种困难的一些想法

一九七一年十二月十六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短评叫《发展社会主义的文艺创作》，号召“要认真学习毛主席的文艺思想，并且要选读一些鲁迅的杂文。”

毛主席过去多次教导我们要学习鲁迅的杂文，有时甚至举出具体的杂文篇名，指示学习的要点。主席对于鲁迅的著作

很早就是很熟悉的，对于鲁迅的评价是非常全面的、深刻的，指出“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完全超过了五十年来任何人对于鲁迅的评价，我们应当遵照毛主席的评价和教导来学习鲁迅。

半年来的报刊上，有不少介绍和论述鲁迅杂文的文章，说“鲁迅的杂文是阶级斗争经验的总结”，或者说“从鲁迅的杂文中学习阶级斗争的经验”，号召学习鲁迅的杂文；但也有很多同志反映鲁迅杂文难懂。一九七二年《红旗》杂志第三期发表的《为什么要提倡读一些鲁迅的杂文？》中说难懂的原因有三方面：第一，对文章的历史背景以及其中所举的一些历史事例不熟悉。第二，若干杂文的表现形式比较隐晦曲折，这是由于历史条件形成的。第三，最重要的，由于鲁迅思想的深刻性，文章的内容和论点也有不容易理解的地方，但这不正是我们应该深入学习和认真领会的吗？怎样解决这三种困难呢？谈一点我的想法：

对于第一种困难，“文章的历史背景”，要用认真学习《毛泽东选集》中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对象、任务、政策和策略等等的教导来解决；比如：《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都应该认真学习。因为鲁迅杂文写作的时间是从一九一八年到一九三六年，正是“五四”时期、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和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毛主席的四卷对这二十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政治社会背景，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产阶级的斗争，有全面的论述和深刻的教导，只有遵循毛主席的这些论述和教导，才能正确理解鲁迅杂

文产生的历史背景。至于鲁迅杂文中“所举的一些历史事例”，一部分要靠注释解决，一部分要用学习中国现代史来帮助解决。毛主席曾多次地教导我们要学习点历史，中国史和世界史。历史是阶级斗争的记录，鲁迅利用杂文反映阶级斗争、参加阶级斗争，而他的杂文本身也是阶级斗争经验的总结。

对于第二种困难，就是表现形式隐晦曲折、难懂的问题，注释可以解决一部分；但主要的还是要靠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也要注意鲁迅自己对于他的杂文的说明和解释，有些写在每本杂文集的序言、前记、题记或后记中，有时写在书信中，有时在其他杂文中。此外，也还要有一些文化知识和社会生活方面的了解。这些都不是很难的，不要有畏难情绪。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参考《鲁迅杂文选》的注释（这些注释也不一定都正确和准确），用心地读下去，对于每一篇杂文的基本内容，也就是它的主题思想，会大致掌握，不会毫无所得的。何况鲁迅杂文并不都是隐晦曲折，只是“若干杂文的表现形式比较隐晦曲折”，也有很多明白晓畅的。例如，一九七一年冬天人民日报社印的一本供内部学习用的《鲁迅杂文书信选》所选的三十六篇杂文中，也只是极少数几篇的有些地方比较隐晦曲折，如《“醉眼”中的朦胧》、《“民族主义文学”的任务和运命》、《关于中国的两三件事》、《半夏小集》这几篇。其他各篇，则参考注释，基本上可以弄懂。将来随着我们思想文化水平的提高、生活和斗争的实践经验的丰富，会逐渐加深理解，懂得更多。

鲁迅在给人信里说“我的文章，未有阅历的人实在不见得看得懂，而中国的读书人，又是不注意世事的居多，所以真是无法可想。”我们现在处于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

主义建设的时代，和鲁迅的时代自然有所不同，但现在的“世事”基本上仍是鲁迅时代的阶级斗争的继续。我们如果经常参加三大革命运动，注意“世事”，则鲁迅时代所斗争的阶级敌人的本质和敌人所采用的方式方法，我们会在现在的斗争中找到敌人的某些相似之处，从而帮助我们理解鲁迅的杂文；同时，鲁迅杂文所总结的阶级斗争经验对于我们参加现在的阶级斗争就很有用处了。和鲁迅生活在同时代的人，固然对于阅读鲁迅杂文有某些方便条件，但也要看他的思想生活情况如何。二三十年代不是有很多歪曲诬蔑鲁迅的吗？解放后也还有不少。我们有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作指导，相信会从鲁迅杂文中学到一些宝贵的东西。

对于第三种困难：“鲁迅思想的深刻性”“内容和论点有不容易理解的地方”，我想上面第一、二种困难如能基本上解决，这个困难就也可以解决大部分了，内容和论点也基本上可以掌握。不过如能在参加三大革命运动的斗争中不断提高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再学习一下二三十年代文艺界的思想斗争和社会政治的历史，将会更好一些。

二、从鲁迅的生平和斗争 看他的杂文的思想性

（一）一八八一——一八九八，在浙江绍兴，少年时期（十八岁以前）

鲁迅，姓周，初名樟寿，字豫才，后又名树人。鲁迅是他一九一八年发表《狂人日记》时开始用的笔名（他母亲姓

鲁）。一八八一年九月二十五日生于浙江绍兴城内，家有四五十亩水田，是小康人家。祖父周介孚是清朝的进士，做过翰林院编修，鲁迅十三岁时他因事下狱。父亲周伯宜是一个读书人，在鲁迅十六岁时因病去世。母亲鲁瑞，出生于农村，以自修得到看书的学力。

鲁迅从七岁起在私塾读书，除读一般规定的古书外，还看了不少“野史”、笔记和小说，对于民间文艺如民间故事、传说和绘画，他也很爱好。故乡绍兴府的古代先贤的反抗精神和他们的著作，引起他的尊敬和注意。他还受过嵇康的“非汤武而薄周孔”，反儒家礼教和不满黑暗政治的思想影响。

当他祖父被捕入狱后，他和母亲等到农村外婆家去避难，以后又去过几次农村，因而接近了农民和农民的孩子，了解了农民“毕生受着压迫，很多苦痛”，给他以后描写农民，为解放被压迫人民而战斗终生打下了基础。父亲死后，他的家“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甚至连极少的学费也弄不到，于是不得不另谋出路。到十八岁时，母亲为他筹了八元路费，去南京入了不要学费的江南水师学堂。

（二）一八九八——一九〇九，在南京和日本，青年时期（十八——二十九岁）

鲁迅十八岁到了南京，正是戊戌（一八九八）变法，康有为、梁启超搞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君主立宪）所谓“维新运动”的时候。他入学不久，就对这个学校感到不满，到第二年就改入了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的铁路矿务学堂，读到一九〇一年底。

在南京三、四年，他接触到当时所谓“新学”，即资本主义的“科学”和“民主”；其中影响他最大的是英国进化论者赫胥黎所著的《天演论》（严复译）。他从此接受了达尔文的进化论思想，使之成为他前期（一九〇七——一九二七）战斗的思想武器，用它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斗争，直到他学习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掌握了阶级论和唯物辩证法为止。

一九〇一年底他在路矿学堂毕业，一九〇二年被派往日本学习。先在东京弘文学院学了两年日文，同时广泛地阅读了哲学和文学书籍，并开始研究“国民性”问题，也就是研究当时大多数中国人的思想状况，希望从这里找到救国的办法。一八九四年的中日战争，一九〇〇年的八国联军攻陷北京，都表现了清朝统治者腐败无能，丧权辱国，割地赔款，使帝国主义长驱直入，中华民族日趋危亡。鲁迅的“我以我血荐轩辕”的《自题小像》一诗，表现了他终生为祖国献身的思想，就是一九〇二年到日本后作的。

一九〇四年的秋天，鲁迅离开东京，到仙台入医学专门学校，他打算从医学入手，使中国进步、强盛。后又觉得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壮，也不能救国；救国的要着，首先在于改变国民的精神，即改造人们的思想。而改变国民精神的最有力的工具，他当时以为就是文艺。于是便决心提倡文艺运动，从事文学工作，一九〇六年七月中止了学医。

一九〇七年鲁迅在东京和几个朋友计划办一种名叫《新生》的文艺杂志，但由于人力和物力的缺乏，没有实现。这一年，鲁迅写了《人之历史》、《科学史教篇》、《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四篇重要论文，介绍了当时世界上进

步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文学，是中国近代思想史中的进步的组成部分，现约略介绍于下：

《人之历史》：通过介绍十九世纪德国进化论者黑格尔（E·Haeckel，一八三四——一九一九，通译赫克尔）的“种族发生学”（即人种发展史），介绍了进化论的各种著名学说。从这篇论文看，鲁迅当时对进化论的各种学说已有较深入的研究和学习，受它的影响很深；这是他今后二十年（一九〇七——一九二七）反帝反封建反买办资产阶级斗争的主要思想武器。

《科学史教篇》：全文简要地介绍了欧洲自然科学从希腊罗马到十九世纪初的发展概况。认为科学之所以发展，是由于人们“勤勉艰苦”劳动的结果，故“谓之教训”。指出科学与实业“相互为援，于以两进”，科学是应实业的需要而发达的，它离不开现实的需要；实业也因科学的发达而发达。这就说明了科学的各种发明并不是由于科学家的天才创造。他还主张要历史地对待文化遗产，不能用现在的标准去要求古人，要“相度其所能至而较量之，决论之出，斯近正耳。”也不能说“近世学说，无不本之古人”，“一若今之学术艺文，皆我数千载前所已具”，狂妄自大，顽固保守，好象阿Q自夸他先前怎样阔一样；到一九一八年他又在《随感录三十八》里批判了“外国的东西，中国都已有过；某种科学，即某子所说的云云”这种骄傲自满的思想。

《文化偏至论》：本文批判了十九世纪的世界文化思潮偏到一方面去了，就是重物质，崇众数；它提出要重精神，重个人。他反对走“重物质”的道路来救中国，即反对单纯搞武力、兵事救国和工商业救国；反对走“崇众数”的道路

来救中国，即反对用资产阶级的“立宪国会”所谓“国民代表”的众数来救中国。他认为兵事和工商业固然不能救中国，“立宪国会”的资产阶级议会制度，不过是“托言众治，压制乃尤烈于暴君”。“古之临民者，一独夫也；由今之道，且顿变而为千万无赖之尤，民不堪命矣，于兴国究何与焉。”在十月革命前十年，五四运动前十二年，马克思主义还没有在中国传播，处在辛亥革命前四年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鲁迅，竟能对资产阶级专政的假民主的议会政治批判的如此深刻，不能不说是当时很突出的思想家和革命家。他之所以重精神、重个人，也是要使人们的精神从封建思想中解放出来，使“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人国既建，乃始雄厉无前，屹然独见于天下。”

《摩罗诗力说》：摩罗，通作魔罗，梵语，即恶魔，魔鬼；基督教称为撒但。传说摩罗和神（或上帝）为敌，有叛逆反抗精神；鲁迅在此借用，对有反抗战斗精神的诗人的诗，说它具有摩罗的诗力。

全文约二万四千字，是当时罕见的长篇文学论文，介绍了十九世纪欧洲八个具有反抗战斗精神和爱国思想的积极浪漫主义诗人：英国的拜伦、雪莱，俄国的普希金、莱孟托夫，波兰的密克微支、斯洛伐支奇、克拉甸斯奇，匈牙利的裴多菲。说他们“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而为世所不甚愉悦。”他们“不为顺世和乐之音”，“其文章无不函刚健抗拒破坏挑战之声，平和之人，能无惧乎？于是谓之撒但。”

“拜伦、雪莱，虽蒙摩罗之谥，亦第人焉而已。”“今索诸中国，为精神界之战士者安在？”鲁迅极希望中国当时能有这样的精神界战士反抗战斗。他并用此标准，评价了屈原：

“放言无惮，为前人所不敢言。然中亦多芳菲凄恻之音，而反抗挑战，则终其篇未能见，感动后世，为力非强。”这就和几十年后有些人心目中的屈原有所不同。到一九三五年，在《从帮忙到扯淡》中，他又说“屈原是‘楚辞’的开山老祖，而他的《离骚》，却只是不得帮忙的不平。”

鲁迅说拜伦对待受压迫而不能反抗的人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这也是鲁迅在十多年后五四运动时期的小说创作中对待他写的被压迫人物的主要思想，尤其对阿Q。但这不一定是受拜伦的影响。

这一篇还表现了鲁迅已有朴素的辩证法观点：他认为自然界和人间自古以来充满着矛盾斗争，平和不过是暂时的现象；他反对为着平和而不敢面对现实斗争，逃避于理想之域，或唐虞古初；反对老子的“无为”思想。又说自然界和社会都是进化的。鲁迅已在用进化论的发展观点来看问题。

除一九〇七年写的这四篇重要论文外，在一九〇三年写的《中国地质略论》中已有强烈的爱国反帝思想。一九〇八年又写了《破恶声论》（未完稿），要破三种“恶声”（坏声音、罪恶的声音）：破迷信、崇侵略、尽义务。破尽义务这一部分未完成。1、破“破迷信”的恶声：他认为农民劳苦一年，在冬闲时“举酒自劳，洁牲酬神……稍息心体，备更服劳”，不能算迷信，当作迷信来破，是不对的。也不能把神话当作迷信来破。2、破“崇侵略”的恶声：崇侵略，即崇尚帝国主义侵略，鲁迅要破这种恶声，就是反对帝国主义。他反对任何大国侵略弱小国家；反对侵略别人，也反对托尔斯太的勿抵抗主义。主张中国应该“扶掖”“危邦”，帮助被压迫小国，使帝国主义“失其臣奴”即失掉它的压迫剥削

的对象。鲁迅一九〇八年的这种思想，只有毛主席领导的新中国才实现了。

此外，还译了一些北欧小说，后来收在《域外小说集》中。

一九〇八年，鲁迅在日本认识了当时的革命家章太炎，并且加入了当时的革命组织“光复会”为会员，参加推翻清朝统治的革命运动。

（三）一九〇九——一九一七，从辛亥革命前后到十月革命（二十九——三十七岁）

一九〇九年夏，辛亥革命（一九一一）的前夜，鲁迅从日本回国，担任杭州两级师范学堂的化学和生理学教员。一九一〇年暑假回到故乡绍兴，担任绍兴中学堂的博物学和生理学教员兼学监（相当于教务主任）。

一九一一年十月辛亥革命爆发，鲁迅热烈欢迎这个推翻几千年封建专制的革命。绍兴光复后，鲁迅担任了绍兴师范学校的校长。也在这一年他写了文言小说《怀旧》，描写一位私塾教师愚昧可笑，显示了反封建的讽刺才能。

一九一三年写《拟播布美术意见书》，他认为美术是经过美术家的思想（思理）改造了和美化了的客观世界的自然之物（天物），“即用思理以美化天物之谓。”这是朴素的唯物论的美学理论，虽然还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

一九一二年，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鲁迅应教育总长蔡元培的邀请，到教育部工作（任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后升金事）。不久，临时政府迁往北京，鲁迅随之北